

孙波



先秦名辩经典释读

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非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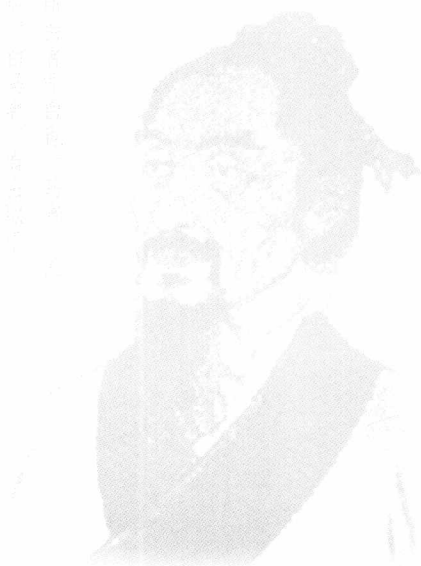


孙
波

著

先秦名辩经典释读

《公孙龙子》是战国时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代表作。全书共分八篇，主要论述了“白马非马”“离坚白”等命题。《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人物墨子的著作，主要论述了“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荀子》是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著作，主要论述了“性恶论”“礼法并重”等思想。《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的著作，主要论述了“法治”“术治”“势治”等思想。《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一部杂家著作，主要论述了“兼爱”“非攻”“尚贤”等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名辩经典释读/孙波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3

ISBN 978-7-80123-970-9

I. 先… II. 孙… III. ①逻辑-研究-中国-先秦时代②辩学-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1395 号

先秦名辩经典释读

孙 波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伟达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640×960 毫米 16 开本 18 印张 200 千字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970-9

定 价: 28.00 元



孙 波 男，生于1970年，江苏沐阳人。199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教研室、中外哲学教研室。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副编审。主要学术领域：中国逻辑史、中国哲学。主要学术成果有：《墨子注释》（专著）、《管子注释》（专著）、《世界哲学名篇博览》（合著），以及“论连珠体的逻辑性质”、“譬与譬式推理”、“世纪末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等学术论文十余篇。

本书简介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地带。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涌现出儒、墨、名、道、法等众多学派,学术文化高度繁荣,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这其中,诸子们围绕“名实”关系以及逻辑思维方式、方法等展开的辩论和争辩,成为先秦百家争鸣中极富特色的一脉。

先秦名辩学是中国先秦逻辑史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但相形而言,迄今为止对于名辩整体史料的挖掘、整理依然不足,研究成果寥寥。本书在参考借鉴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对先秦史籍中有关名辩学说的思想资料,包括与此相关的逻辑学内容和某些认识论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类、校勘和注疏,并用通俗的语言对原文作了诠释。本书认为,先秦名辩学说,是名学和辩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结合。关于“名实”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先秦各派纷争的焦点,也是诸子们展开其学术体系和政治主张的逻辑前提。本书认为,先秦名辩概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实践,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睿智,不仅推动了先秦的政治社会的发展,而且为后世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学说等多种思想范式。经过千百年来锤炼与圆融,先秦名辩思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构成了后续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主体,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生活方式、思

想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成为千百年来一脉传承的民族文
化特质的核心与主流,这也正是研究先秦名辩的现代价值。本书
试图从整体上勾勒、展现先秦名辩学术和名辩艺术的大纲,使读
者能品味微言大义,感怀中华古典智慧。也为相应的学术研究,
提供一份初步的参考资料。

目 录

前 言	先秦名辩思潮概览 / 1
第一章	正言若反——老子的辩证法则 / 10
第二章	刑名之辩——邓析的辩讼之道 / 22
第三章	名正言顺——孔子的正名思想 / 51
第四章	名正则治——管子的治国方略 / 60
第五章	以名举实——墨家的辩学体系 / 76
第六章	知类求故——孟子的精湛辩术 / 90
第七章	历物十事——惠施的奇辞怪说 / 105
第八章	不谴是非——庄子的无辩逻辑 / 119
第九章	名以正形——尹文的形名妙论 / 139
第十章	白马非马——公孙龙的雄辩命题 / 148
第十一章	名定实辨——荀子的名实理论 / 175
第十二章	按实审名——吕不韦的精微妙义 / 205
第十三章	矛盾之难——韩非的刑名法术 / 225
第十四章	奇策异智——纵横家的游说权谋 / 238
附 录	/ 251
参考书目	/ 277
后 记	/ 280

前言

先秦名辩思潮概览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地带。当时,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涌现出儒、墨、名、道、法等众多学派,学术文化高度繁荣,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走向成熟。这其中,诸子们围绕“名实”关系以及逻辑思维方式、方法等展开的辩论和争拗,飞扬恣肆,思潮涌动,异彩纷呈,成为先秦百家争鸣中极富特色的一脉。

一、关于先秦的“名辩学”

先秦的名辩学说,是名学和辩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机结合。《中国大百科全书》明确地说,“名辩”是“名学和辩学的合称。主要指先秦诸子关于名和辩的逻辑思想和理论,泛指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①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关于“名实”关系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是先秦各派纷争的焦点,也是诸子们展开其学术体系和政治主张的逻辑前提。而这种观点的冲突与碰撞,是围绕一定的辩说原则和辩论程式展开的。因而,辩的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实质、功用、有效性等,也自然成为先秦学术研究的重点。墨子说:“辩,争彼也。辩胜,当也。”(《墨子·经上》),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直观解答。

事实上,先秦名学是在论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而先秦辩学也有赖于名实之辩的推动和思想素材的积累。先秦的名学和辩学,是互动而生,并行发展的。“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墨子·小取》)先秦的名辩思潮,正是先秦名学和辩学交汇融通的珍贵结晶。

二、名辩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先秦名辩思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动因。

首先,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是名辩思潮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春秋时,随着牛耕的出现以及铁的发明和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出现了众多手工业者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大商人、大手工业者就有陶朱公、白圭、刁间、程郑、蜀卓氏等。由于商业的发展,作为交换中心的城市也相应兴起,到战国时代,城市规模显著扩大,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的局面。与此同时,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开始萌芽,井田制走向崩溃,赋税改革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形成、壮大,并逐步取得政权。社会开始大动荡大转折,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结构系统的解体与重建,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学术

思想的争鸣。

其次,上层建筑的解体与重组,意识形态的多元,为名辩思潮的产生提供了精神动力。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日益得势,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受封诸侯之间战事连绵,“春秋五霸”相继出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所代替。经过春秋二百余年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周初分封的七十一个诸侯国仅剩下来秦、齐、楚、赵、魏、韩等七个大诸侯国以及为数不多的小诸侯国。胡适在谈到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状况时说:“政治忠诚的迅速改变(例如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引起了封建等级结构的崩溃,这一时期到处充满了批评精神,以至现存的社会政治态度以及真理和道德的传统标准都会受到无情的批评和攻击。”^①而处于剧变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统一的富国强兵之政和“救世”良方。加之“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汉书·艺文志》),有重法轻商、有尊儒尚农等,也给各种思想、各种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条件。因而《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皆起于王道既衰,诸侯力政,是以九家之术,蜂起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此外,随着周王朝的覆灭,“尊天”、“敬神”的传统信仰日渐动摇,出现了“夫民,神之主也”(《左传·季梁谏追楚师·桓公六年》)这样的民本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松动,为名辩思潮的产生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再次,教育拓展以及“士”的崛起,为名辩思潮的产生提供了知识和人才储备。西周时,“学在官府”,教育是贵族子弟的专利。而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剧烈变动,贵族、学士遭贬,典籍散落民间,文化知识在社会上得以流传,私人讲学之风兴

^① 胡适:《先秦名学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盛,孔子即主张“有教无类”,破除等级、地域界限,大量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子弟入学。随着教育范围的扩大,崇学、“礼贤”之风盛行,《韩非子》记载:“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之士者,邑之半”。教育的下移和兴盛,大量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为“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在西周时,“士”还只是古代贵族中最低的一级。但从春秋时期起,“士”的数量开始激增,“士”人本身也由过去的文武不分,转变为研究“诗、书、礼、乐”的“文士”,日渐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重用。各国为了变法图强,无不以“招贤纳士”为治国首要,并修建了稷下学宫这类专供“士”阶层聚识谈艺的专门活动场所。“士”人经常流动于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所谓“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已经成为战国时期的政治共识。随着“士”走向社会政治舞台,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宰,名辩思潮的这一语言狂欢的大戏终于揭开了帷幕。

三、名辩思潮的主要内容

作为这场浩大的思想文化热潮的主体,先秦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名辩学者及其领军人物。刘向所说的“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在此,我们仅就其关于名实问题的主要主张,作一简要介绍。

邓析,《汉书·艺文志》列其为名家第一人。邓析“好刑名”,并以此来推广和规范法律条文,对于推动当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庶人议政之风起了很大影响。孔子则最早提出了“名”这个逻辑术语,认识到了“正名”的重要

性,并把“正名”作为“正政”的前提。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并探讨了“叩其两端”的言辞说话技巧。管子也主张,“名正则治,名倚则乱”。

道教始祖老子“以自隐无名为本”。《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具有系统而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系,多次讲到了“名”、“言”、“辩”等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主要概念。庄子继承了《老子》对名、言、辩的看法,对儒家的“正名”和辩论采取否定的态度。庄子认为,名实是混淆不清的,天下往往是因为辩而生乱,所以倡导“不言之辩”,主张“大辩不言”、“辩无胜”,唯有“止辩”。而墨子则从生产实际和生活经验出发,反对儒家倡导的以“名”定“实”的唯心主义“正名”论,明确提出“取实”重于“命名”的唯物主义观点。墨子还提出了检验认识是非真假的三条标准,即“三表法”。

“亚圣”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在“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之际,孟子极力捍卫“孔子之道”,排斥“杨墨”。孟子“知言”、“好辩”,擅长运用各种类型的类比推理,词锋犀利,论证缜密。被《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第二的尹文子,也极为善辩,曾与齐王辩论过“人君之事”,以及关于“士”的问题,并把“正名”作为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他说:“大要在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尹文子提出的“正名”二义,即“以形正名”和“以名正形”,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提出的“正名”理论。

此外,唯物主义者荀子强调“实”是“名”的客观基础,“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提出了“制名以指实”的观点。荀子最先把“名”和“辩”结合起来,指出“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韩非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之说”,巧妙地阐述和论证了逻辑矛盾律。他还论述了“审名”(定义)、“辩类”(分类)和“参验”(比

较、实验和归纳证明)的思想。而在吕不韦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中,保存了不少先秦的名辩思想资料,同时也表达了编著者对一些逻辑和名辩问题的见解。其中,对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探讨,对正名理论的发挥,对推理和推类的论述,对辩察和辩说的分析等,都有精辟的见解。

先秦时期还出现了众多持有违逆常识观点并引发诸多争议的辩者。其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最为知名的,是《庄子·天下》列举的“历物之意”十个论题,“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而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离坚白”,则引起空前轰动,当世学者讨伐之声不绝于耳,“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尤也。”(《庄子·天下》)

此外,在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纵横家,其主要人物鬼谷子、苏秦、张仪等所谓的“游士”、“策士”、“谋士”或“游说权谋之徒”,也从当时“合纵连横”的政治需求出发,提出了许多有关名辩思想的有价值的见解。

四、名辩思潮的衰落

名辩思潮,在经过先秦时期的长足发展后,逐步走向衰落。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至东汉班固编修《汉书》时,“名家”仅余七人,遗著三十六篇。到了公元3世纪末,西晋鲁胜云,先秦时期“世有篇籍”的名家著作已经“亡绝”。到了唐代,名家著作更是仅收集到“邓析子一卷,尹文子二卷”(《隋书·经籍志》)。大部分名家著作在秦以后已经散佚而成“绝学”。

名辩思潮最终走向衰落,首先是因为中央政治集权的建立以

及思想禁锢政策的压制。战国末期,中国社会由诸侯割据逐步走向统一,思想上也开始由百家争鸣逐步定于一尊。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始皇除了运用其政治、经济手段巩固政权外,在思想领域里也采取了压制政策。在其统治后期,焚书坑儒,取缔私学,禁止“以古非今”,大肆实行文化专制。在如此险恶的文化生态里,恣肆张扬的名辩之风自然没有了生存的土壤。

名辩思潮最终走向衰落,也与名家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西晋学者鲁胜,把名学败亡归咎为其晦涩艰深,流传困难。“自邓析至秦时,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颇难知,后学莫复传习,至于今五百余岁,遂至亡绝。”(《晋书·隐逸传·墨辩注序》)近代学者伍非百先生也认为,“因为名家综核名实,观察太精密,议论太锋锐,虚则虚,实则实,真真伪伪,丝毫不容假借。专制皇帝最怕他们明辨是非,揭露本质,动摇人心。一批所谓正统的学者,也怕他们甚于洪水猛兽。专制皇帝用牢狱、捕快、刀锯、鼎镬对待他们,而所谓的正统学者在辩论真理方面,敌他们不过,就利用帝王的权威,以刑罚禁锢把这派思想扼杀。因此,名家书籍,亡绝得最早最速了”。^①

五、名辩思潮的现代研究

先秦“名辩学”作为一个学术门类,是一百多年前的近代学者在译介西方逻辑著作的过程中提出并开始研究的。

“名学”一词最早是用以称谓西方逻辑的汉语译名。公元 1824 年(即清道光四年),乐学溪堂刊行了《名学类通》,译者佚

^①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序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名,原著者不详,这是“名学”一词的首次出现。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逻辑再度传入我国,以“名学”作译名的西方逻辑译著逐渐增多,著名的有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1905年)和《名学浅说》(1909年)、陈文编译的《名学释例》(1910年)等。与此同时,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和诸子学的兴起,“名学”之名,转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这方面的代表是胡适的《先秦名学史》、陈启天的《中国古代名学论略》、虞愚的《中国名学》、陈显文的《名学通论》以及齐树楷的《中国名学考略》等等。

“辩学”一词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所作《辩学遗牍》,这本书记录的是来华传教士与我国佛、道教徒进行辩论的具体情形。“辩学”最早也是用来指称西方逻辑学,如1896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就将耶方斯所著的《逻辑初级读本》译为《辩学启蒙》。1908年,王国维又将耶方斯的另一部逻辑著作《逻辑基础教程:演绎与归纳》译作《辩学》出版。后来,“辩学”一词也被一些研究者用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如郭湛波的《先秦辩学史》、萧平的《关于先秦辩学》等。

由此可见,“名学”和“辩学”最早是西方逻辑的译名,后来逐步成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代称。在当前学界,关于“名学”、“辩学”以及“名辩学”的具体界定以及与逻辑学、中国逻辑史的关系等方面,尚存有一定争议。但无可否认,在先秦,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已经通过其自身正名立言的实践,逐步建构起名辩学术和名辩艺术的大纲,成为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古代哲学史中极具特色的一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思想成果,先秦名辩概括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多元实践,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睿智,不仅推动了先秦的政治社会的发展,而且为后世中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学说等多种思想范式。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与圆融,先

秦名辩思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构成了后续中国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主体,在政治意识、典章制度、军事法律、统治策略、道德教化、哲学信仰等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成为千百年来一脉传承的民族文化特质的核心部分。这也正是研究先秦名辩的现代价值。

六、编撰说明

本书所选范围,以先秦有关名辩学说的思想资料为主,包括与此相关的逻辑学内容和某些认识论内容。为了有助于研究,对于学界有争议的所谓“伪书”,本书也按同样原则作了选译。对于名辩学者的排列,以其历史年代为序。为便于阅读,“释读”部分有些作了意译;原文中的通假字,也大多以今字替代。

第一章 正言若反——老子的辩证法则

一、老聃其人其事

老聃(约公元前 580 年—公元前 500 年),姓李名耳,又称为老子,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省东部)人。作过东周的“守藏室之吏”,也即国家图书馆的管理者。老聃饱览文化典籍,才学过人,相传为“南方学派”的首领。老聃潜心研究“道”、“德”,“以自隐无名为务”,后被尊奉为道教始祖。东周衰败没落后,西出函谷关到了秦国,终其一生。

老聃的思想集中在《老子》一书中(据考《老子》一书不一定是老子本人所写,但其中反映了老子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分为上、下篇,计八十一章,凡五千余言。《老子》用“道”的概念,表达对于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其中包括了动和静、变和常、多样性和统一性等规定的对立统一。《老子》包含了一个系统而丰富的辩证思维体系,该书第七十八章提出“正言若反”,这个命题以及《老子》中大量类似的句子,体现了对立概念之间的流动和转化。而有些“正言若反”式的判断,则表现了现象和本质